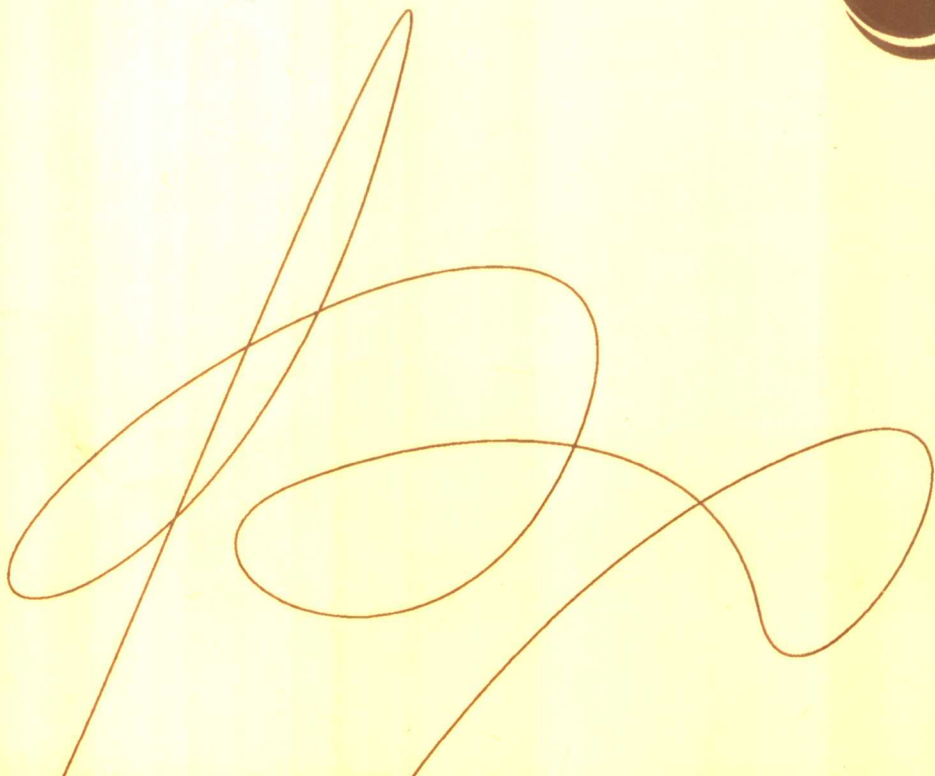


友谊凤凰丛书
凤凰卫视

世纪大讲堂

流變



版公司



友谊
凤凰丛书
凤凰卫视

世纪大讲
堂

流 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大讲堂.流变 /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7.5

ISBN 978-7-5057-2320-7

I. 世... II. 凤...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②自然科学—文集 IV. Z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7713 号

书名	世纪大讲堂·流变
编者	凤凰卫视出版中心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规格	710 × 1020 毫米 16 开
	19 印张 287 千字
版次	2007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20-7/G · 258
定价	29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在热闹处安静听

刘长乐 /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、行政总裁

“世纪大讲堂”开讲六年多，已有三百多位演讲者登台，四位凤凰卫视主持人接力主持，千百学生现场听讲提问，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——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：我们的民族，在这个娱乐成风的时代，需要更多的高端文化品质的浸润和引悟。

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，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，对它后来的影响力我曾称为“意外的成功”，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。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，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，是方法，也是态度。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，强调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于是，一堂堂相对静态的演讲，被传播放大，又以思想的厚重支持了传播，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，惠泽于四野。

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，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，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。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，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，他们在讲堂相遇，都应是生命的盛事。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，张弛有度的节奏掌控，将那山河之问，化作了行云流水。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，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，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，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。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，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。这些交流，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，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。

凤凰卫视出版中心选择“世纪大讲堂”历年的经典演讲，分类编纂，经纬梳理，纵横捭阖，并约得演讲者各自的观点新文，荟萃为《国学》《流变》《清议》各篇，这些当今大中华的思想风华，在讲堂讲述、电视传播、文本精编中，厚积而薄发，宁静而致远。

世纪大讲堂，因之余音袅袅。

世纪大讲堂

流變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在热闹处安静听 | 刘长乐 | 1 |
| 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 | 袁伟时 | 1 |
|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| 许纪霖 | 15 |
| 对城市建设的文化阅读 | 杨东平 | 31 |
| 潜规则——在历史中拆解人间对局 | 吴思 | 49 |
|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| 茅于軾 | 69 |
| 中国大学百年 | 陈平原 | 85 |
|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| 周国平 | 105 |
| 「因为大地有梦想」 | 徐刚 | 121 |
| 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吗？ | 霍韬晦 | 135 |

流變

世紀大講堂

中国近代史的非常道	余世存	151
解读中国当前文化思维中的几大误区	余秋雨	169
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	白先勇	187
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	易中天	201
文学中的上海、北京与香港	许子东	217
同性恋者的处境	李银河	237
毛泽东、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	沈志华	255
历史地理学能为未来做什么	葛剑雄	281

袁伟时

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



袁伟时简历

1931年12月出生在广东省兴宁县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学本科与研究生一直读经济专业，后转向研究中国近代史。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帝国落日·晚清大变局》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《路标与灵魂的拷问》《中国现代思想散论》《告别中世纪——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》等，主编：《现代与传统丛书》《荒原学术文丛》《牛蛇文丛》等。

曾子墨：那么小就参加革命，按您的话来说是个造反派。一般人可能都觉得无产阶级成分的人才会成为造反派，要么贫下中农，要么是工人阶级，我不知道您原来家庭状况是怎样？

袁伟时：我的家庭状况相当好，从小不愁衣食，而且是资产阶级，又是大地主。在我家乡，我祖父这个家族是当地姓袁的最大的家族，也是最大的地主。他建的一座大屋，光是房间就一百多间。

曾子墨：一百多间房，几个人住？

袁伟时：没有多少人住。还有三十多个厅堂。我外祖父那个家族，是当地另一大姓刘姓最大的一个家族。两家后来都向资产阶级转化，所以衣食对我完全不是问题，经济条件较好。我在1931年，也就是“九一八”那一年出生，以后一直在战乱年代成长，所以从小盼望中国富强；加上我很喜欢读书，进而就关心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生活环境推动我去寻找这个秘密。

曾子墨：这么好的家庭环境，无论是早年作为大地主，还是后来您所说的资产阶级，按理说即使要探求一个救国救民的道路，想给中国找一条出路，也应该认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，怎么会认同的是共产党的这样一条道路呢？

袁伟时：有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，就是胡绳写的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。那本书其实是诠释毛泽东的一个结论，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，都不行，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这条道路，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。我最初很相信，后来经过反复研究，到1992年我写出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》（增订新版改名为《帝国落日·晚清大变局》），在那本书序言里，我又提出这个问题：“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？”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，加上几十年的建设，富强、民主依然是奋斗目标。可见道路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。我的另外一本书《中国现代思想散论》，其中有一篇研究严复思想的文章。我认为1895年严复讲的13个字，就将中国救国救民的道路说清楚了。他说：“身贵自由，国贵自主”；为什么西方那么发达，而中国学西方却不行，到最后还是给日本

打败了，他说关键在“自由不自由”。

曾子墨：好，有请袁伟时先生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演讲《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》。

讲大国兴衰，需要回答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大国？光是从土地和人口来看，中国老早就就是大国了。究竟标准在哪里？在我看来，所谓大国，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，它体现为几方面：一个是它的制度，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；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；第三个是生活水平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富裕；第四个，对国际事务有较大影响。北欧有些国家很富裕，但在国际事务上没有什么重大影响，那也很难称为大国。

第二个问题，究竟大国兴衰的关键在哪里？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·森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，又是它的主要手段”，这句话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。

刚才我说过，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，严复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，写了五篇文章，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，学了30年，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，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？他就说了13个字，“身贵自由，国贵自主”；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“自由不自由”。一百年后，亚马蒂亚·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。

我们看一看17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，答案就一清二楚了。

1640年英国革命。就在那个时候，1644年满族人主中原，建立了大清帝国。它的版图是1200万平方公里，是中国历史上除元代以外最大的。还有一个是俄罗斯，17世纪80年代，彼得大帝开始执政，一直到18世纪初，励精图治，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、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国家，建成一个俄罗斯帝国。这三个国家的兴衰，蕴藏着历史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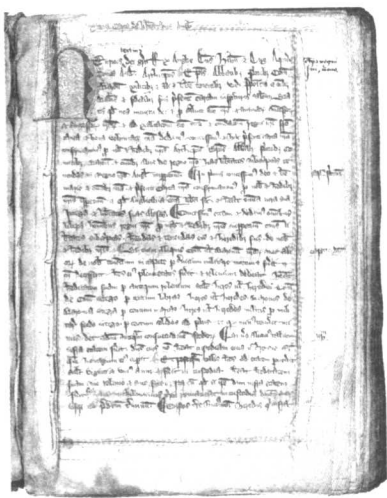
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。

首先讲俄罗斯。彼得大帝励精图治，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？关键的原因是什么？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，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。俄罗斯10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，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，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。他把任命东正教最高层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，把东正教会变成皇权的侍从，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。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，沙皇可以为所欲为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国家没有民主，人民没有自由，它兴盛不起来。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，18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，创建了莫斯科大学，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学术成果，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。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，人民的积极性、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。

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。17、18世纪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。利玛窦1582年到澳门，然后进入内地。1601年到达北京，在北京工作10年，1610年逝世。这个阶段他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，先进的学术文化，包括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相当大一部分，将中国的天文、历算、日历都改革了。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西方学术、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，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。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，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，制造了几次大事件。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，他做出一个决定，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，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，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，其他人统统送出去。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，可以信教，但是不准传教，也不准回国。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。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，打算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，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，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。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，一直不肯打开国门，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。

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。其实那个传统是皇权的专制。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：一个是非制度性的，物质的和非物质的，里面有很多瑰宝。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，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。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。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受到压制。压制到

什么程度呢？一个家庭里面，只要父母、祖父母在，是不准分家的，分家犯法，要坐牢。19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，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。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，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，要办纺织厂，但是不行。80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，在上海筹办，他申请朝廷批准，他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。所谓专利，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，而是说我办了以后，谁也不准再办。官僚垄断，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。中国为什么穷？为什么经济不发达，不能成为大国？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。



Magna Carta as reprinted by Henry VIII in 1537. Digitized by eGangotri

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

英国呢？它从1215年颁布《大宪章》开始，一直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，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条道路。最初很不完善，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，它慢慢完善了。同时它有封建制度，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，再加上教会的牵制，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，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，经过几百年的努力，终于到20世纪变成大众民主。法治制度也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完善，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。

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。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：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。

再来看前苏联的历史经验。前苏联七十一年，表面上很发达，但是最后垮下来了，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不过是纸老虎！原因很简单：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。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，在前苏联，财产权是被剥夺了的；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和法制保证的，前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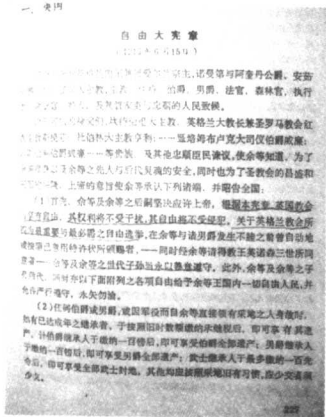
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。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，但是它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可以充分利用，自由可以充分发挥。不行！不准你办企业，那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。其他自由如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更不用说了，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。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，变为官僚说怎

样就怎样，最后则取决于皇帝；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。

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，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，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的障碍究竟在哪里？我想有三个障碍：

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。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？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，只学点皮毛。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。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，这个不能动。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，整个政治体制、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。结果呢，完了，不能兴盛。日本的“明治维新”，中国的“洋务运动”，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步的。但是日本在制度方面学西方，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。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，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，请外国教师，建立西方式的教育，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。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，捧着那几本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在那里拼命念。我不知道现在提倡读经的那些人，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将中国害惨了。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，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，不要学习外国的人，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。要么是无知、愚蠢，要么就是别有用心。

第二个是民粹主义。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？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，空想的利益，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。一些人提出来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，很多人都愿意接受。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道路。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，一方面



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；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，将农业也变为产业，变为商品，只有这样，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。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，有一个观点，我认为很值得注意。他说，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，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，其实人人都有资本，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，也有人力资本家。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。你这个人力，究



在迈向大国的路上，中外都证明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

竟值多少钱，要通过市场来检验。他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，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。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，整个经济才有活力，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。

第三个是极端思潮。要反对极端。现在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，都说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。里面所说的内容，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，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。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，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，实行民主、宪政，提倡理性。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。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，是它的两个口号。但军阀打倒了，中国还是没有自由。得到的是什么呢？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；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，一塌糊涂。

一些极端的東西，我們不應該再重複了。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決問題，正確的道路是將目光緊緊盯住建立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的制度。將制度的建設，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；這個目標是逐步實現的，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達到這些目標，但是，一步一步走過來，就能實現這個目標。年輕人要學會理性地看問題，不要走極端，這個是我的忠告。

曾子墨：我记得在一年多以前，有两位学者曾经到中南海给政治局的常委讲过课，题目好像叫做《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的历史发展的思考》。这个题目所涉及的内容和您应该是非常相似的，但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和您好像不太一样。一位学者曾经说过，他认为国家要想强盛，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第一个前提，其次就是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重商主义，第三还提出了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种模式。我感觉他所总结出来的这三点，其实就是在提倡一种中央的、大一统的集权的方式。这种观点和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，我不知道您怎么样来评价。

袁伟时：这些先生好像都是研究世界史的，他们的知识应该讲比我强。他们讲的在史料各个方面，能够提供一些东西给大家思考，我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罗列整个世界历史，关键在哪里却没有回答。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，前苏联道路，从俄罗斯到前苏联，那是一个极端痛苦的人类经验记忆。对中国来讲，这是必须面对不能回避的问题。为什么俄罗斯看似强大，结果不行。为什么前苏联号称超级大国之一，一下子就垮下去。关键在哪里？他们的讲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回答是不行的。

国家建立起来，作用在哪里？胡适讲过一句话，首先解救你自己。你想救国的话，先救你自己。救自己是什么意思？你从奴隶状态走出来，做一个现代公民，敢于独立思考，对任何问题都敢于独立思考的一个现代公民。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所谓自由思想、独立人格。这对国家的兴盛非常重要。因为从俄罗斯来讲也好，中国也好，都有迷信领袖的问题。他也是人，你也是人，为什么不能独立地思考一下他的成就、他的缺点？政治家或者政客不是神。

曾子墨：自由的制度是不是兴衰的唯一的键？按您所说英国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其实是在逐渐完善的，但是它衰落了。二战之后，印巴独立，其实他们传承了英国的制度，按理来说实行的是民主的制度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没有看到它们成为超级的大国。今天美国可能有着自由民主的制度，谁又能够保证这种制度在未来会让它继续保持这种地位？特别是

在亚洲，像韩国、新加坡还有我国的台湾，他们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，应该说还是相对专制的。专制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，是不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呢？

袁伟时：其实是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自由是不是唯一关键。第二个就说专制的作用，专制在腾飞过程里面的作用。

自由是不是唯一的关键？英国为什么后来衰落了？一方面，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以后，它人口少地也少，本身发展就只能到那样一个程度。刚才我讲民粹主义的时候忘掉讲一个问题：要敢于摆脱福利国家的包袱。英国就是吃民粹主义的亏，它学前苏联搞公有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执政，一下子就将很多大工业国有化，同时福利水平很高，结果就背上大包袱。19世纪70年代，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郑观应就提出来，凡是官办的企业都办不好的，私人企业他自己就会精益求精，因为利益决定。

从民粹主义观点来看，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很大。最近郎咸平就大张旗鼓讨伐国有资产流失。首先要弄清是不是真正流失；其次，要从对整个社会发展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。我举几个例子。

19世纪日本“明治维新”，到70年代跟中国的“洋务运动”一样，碰到一个问题：官办企业亏本，财政负担不了。好，它就卖。当时很多人反对，但它坚决卖。比如说三菱、三井，到现在还存在的大财团，政府将所有的国有轮船都低价卖给它，而且卖了以后还继续给各种优惠条件，结果财政没有负担，而且反过来有税收。

东德又是一个例子。东德垮台以后怎么样处理那些国有工厂呢？有些工厂1马克卖掉，条件就是你继续经营。这个有什么不好？维持很多人就业，可以继续给国家提供税收。所谓公有、私有、国有财产的争议，不能忘掉一个前提：一个人的财富超过一定限度以后，超过部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，这个部分实际是社会资金。社会资金究竟是交给官僚去管理，还是交给聪明的职业经纪人去管理，哪一个对整个社会发展更有利？英国为什么衰落？一个是办国有企业，另外一个就是民粹观点，福利程度太高。结果这一类国家，国内生产总值一半左右归政府支配，人

的积极性就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但是英国自己觉醒了，保守党逐步将公有的企业私有化，削减福利，特别到了撒切尔夫人这一代，大刀阔斧改革，英国的经济重新恢复活力。

英国有个儿子美国。它的整个制度搬到那边去了，而且有所发展。美国继承了英国制度的优秀方面，又避免了过多的民粹的东西，福利相对来说比较少。到现在为止，它的国内生产总值30%左右是由政府支配的，美国经济就非常有力。所以我认为不能讲英国那条路不对，一个关键还是在自由不自由，保障自由的法治制度。因为法治、宪政都是围绕个人自由来转的。

你的第二个问题，是不是国家需要一个专制阶段才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。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还原为怎么样保持社会稳定。有两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办法：一个是用民主与法治的办法，这样的社会稳定最可靠，可以长治久安。另一个是有些国家实行的专制的办法，对恢复国家的秩序，作为一个临时措施，会有它的作用，会有利于经济发展。但是，在高压态势下，各种矛盾积累和激化，终有一天要爆发。所以不能一般地肯定它，要看到它的负面的东西。比如韩国，因为官员权力太大，官商勾结，后来就经不起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付出很大代价。所有歌颂开明专制、专制必要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。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，如果你不是政客的话，就要为整个国家的前途、世界的前途考虑，及时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，要及时地改进民主制度。说扩大自由、实行民主是会带来社会混乱，是没有根据的。

观众：柏杨先生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中指出，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一个酱缸，所有置身其中的中国人，都不可避免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中国从近代一直学习西方，但好像都学得不太像，所有的路好像都走得不太顺。您觉得这是不是受到中国这种民族特性的影响？

袁伟时：任何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优点，也有它的弱点。我对儒家文化是这样看，一方面来讲，它有好的地方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中国的传统制度确实是儒家文化的制度化，所以中华法制就是礼法体系，不是一个法治的传统，而是将中国儒家的所谓礼制，就是以“三纲”为基础的